

# 世界多样与普惠哲学

## ——构建引领新时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 韩庆祥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是“发展”着的一门学问，它总是随着时代和实践发展而不断改变自己的实现形式。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迁，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变革和思想先导。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时代，一定是哲学大发展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哲学工作者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从当今世界发展新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提炼出具有标识性、原创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当今世界格局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正由大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而，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担当起重大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重新思考自己与世界、新时代、实践的关系，构建反映时代精神和实践发展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真正发挥其引领新时代的作用。

### 一、反映当今世界和新时代实践发展总趋势，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前提

要构建反映时代精神和实践发展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首先要对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 world 格局作出总体的科学判断。

(一) 当今中国正步入“发展起来”且由大国迈向强国的关键时期

邓小平曾经提出一个经典的判断：我国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习近平总书记也

指出：“当前，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大量是新出现的问题。”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致可分“欠发展”和“发展起来”两个时期。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我国总体上处于“欠发展”的阶段。但是，自从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总体上步入了“发展起来”的阶段。“发展起来”阶段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且相对“欠发展”阶段而言的一个特定阶段，这是发展起来了，要迎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但还不够发达、不够强大的阶段。美籍华裔学者熊玠指出：“如何解决发展起来以后带来的新问题？这一‘邓公之问’的答卷，如今交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手里。”

历史方位不一样，提出的历史任务往往不一样。马克思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历史使命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中国由大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使命，是结束近代中国任列强欺凌的屈辱历史，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使中国人民“站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所承载的时代使命是力求使中国由穷国成为大国，使中国人民“富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所肩负的历史（时代）使命，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中国

“强大起来”。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回应当代中国实践发展的新要求,推进自身的理论创新。

(二)当今主导世界的权力正逐渐向中国转移且大国博弈日趋激烈

当今世界格局是西方出现某些困局而中国正在逐步崛起。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经济危机、民主乱象等。以资本为中心的游戏规则是导致西方困境的总根源。“自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以来,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资本主导逻辑驱动下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从历史尺度看,“资本创造了近代工业文明,推进了世界发展。然而就其实质来讲,资本的本性是通过运动(矛盾向外转移,利益流向自身)实现价值增殖,而资本的运动是无休止的,哪里能够实现价值增殖,它就会出现在哪里。”资本主义的性质和基因决定了西方国家的经济生活必然遵循资本主导的逻辑。资本主导的逻辑在哲学上体现为资本占有劳动、“主体”统治“客体”,在经济上体现为以攫取剩余价值为目的,并发展到世界范围。当西方从其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过度攫取并挥霍超额利润,使得全球市场出现社会需求严重不足时,资本主义必然出现困境。“这种困境,在经济领域体现为实体经济不振,在政治领域体现为调节无力,在社会领域体现为贫富差距拉大,在意识形态领域体现为普世价值虚伪性暴露。”1978年,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参与到全球化经济中来,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其基本经验可以概括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中国利用资本但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运用资本同时也限制了资本的消极影响,引导资本向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注重加快发展而又保持自身独立;中国主张能体现世界文明平等理念的合作共赢、和平发展、共享普惠,等等。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中国成为迄今为止最成功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也使得中国有条件、有信心为人类发展、人类文明的探索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西方世界陷入某些困局,实质上意味

着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资本主导论的破产,同时呼唤新的世界性理论的出场。

影响世界的权力正在发生转移。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权力转移”已成为人们把握21世纪世界发展趋向的重要坐标。参考和借鉴托夫勒的权力转移理论,整个世界权力转移的总趋向是由暴力主导到资本主导再到创新能力主导。这种转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哲学角度看“权力转移”,有一条基本规律:历史越往以前追溯,人以外的物质因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大;历史从后往前来看,人的创新能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日趋突出。从世界历史看权力转移趋向,主导世界的权力正逐渐向东方转移。把握权力转移趋向,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激发每个人的创新潜能,提出能引领世界共同发展的中国理论,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战略性问题。

当今世界格局的大调整导致了国家之间进行激烈博弈,导致挑战频发,这是权力转移的直接结果。世界格局调整的核心,是争夺引领世界发展的权力和话语权,这必然引起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博弈。从当前中美、美俄、中日以及欧俄、欧美、欧盟之间的博弈就可见一斑。在博弈中,为掌握引领世界的话语权,其中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就是要构建起能引领世界共同发展的中国理论、尤其是哲学理论。总之,这是一个需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也能够产生哲学理论的新时代。

## 二、学者的使命是构建体现时代发展水平的原创性标识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人们只能在其所处的时代创造自己的物质成果和思想成果。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哲学具有时代性、历史性,不同时代、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都会产生自己所需要的哲学。当今学者应以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从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世界格局及其新要求出发,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与发展,构建能引领世界、新时代、实践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时代课题,担当起引领世界、新时代和实践发展的历史使命。

在充分肯定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要清醒看到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还未真正达到新时代发展所要求的水平。总的来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处于全面向西方学习的阶段,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科学技术和文化,等等。其中,中国思想理论界引进了很多国外的学术著作、学术概念和学术思想。这对开阔中国学术界的研究视野、提升中国的学术研究水平和了解西方思想文化,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也出现了一些“西化”倾向,即“耕了西方地、荒了中国田”。

首先,没有全面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世界发展趋势。哲学的创新发展是在经典文本和现实逻辑的互动中逐步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经典文本与现实逻辑相结合的典范,马克思在揭示当时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逻辑和问题中形成了自己的哲学范畴和哲学思想,写出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经典著作。1978年以来,我国哲学界在“经典文本”、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研究方面取得卓越成就,做出了重大学术贡献。然而,我们的哲学研究往往缺乏真正的“问题意识”,一些学者大多坐在书房里研究学问,很少走出书房深入实践做长期深入的社会调研,对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及其蕴含的“中国问题”缺乏全面深入的哲学研究,对1978年以来我国所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时代和实践变化缺乏系统深入的哲学研究,对当今世界格局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世界发展趋势缺乏整体深入的哲学研究;一些学者较为关注西方的议题而不大关心中国议题,甚至少数学者用西方的“公式”“标准”“尺度”“理论”来剪裁、套解、匡衡中国的现实,以至于理论创新动力和理论创新成果不足,在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研究方面不在场和失语,在研究当今世界发展趋势方面丧失一定的话语权,难以引领世界、时代和实践的发展。

其次,没有真正形成直面中国问题的哲学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使用的概念、范畴、表述大多是教科书中的、经典

著作中的和西方的。也就是说,对教科书中的、经典著作中的、尤其是西方的哲学概念、范畴、表述、命题比较了解,我们说的多是“教科书中的话”“文本中的话”和“西方的话”,却不会说直面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的话。因而,要么从概念到概念,没有揭示出所用概念蕴含的生活内涵,要么从生活到生活,没有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的分析研究中提升出中国本土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结果陷入“有概念没生活”或“有生活没概念”的境地。

最后,没有自觉主动去构建“理论中的中国”,没有真正构建起真正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理论。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一种体现,也是我国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前沿问题。当今中西方在思想、理论、文化上的交锋,往往蕴含话语权之争,其中涉及到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思想体系、评价体系问题。任何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思想体系、话语体系、评价体系往往具有“所研问题、研究方法、政治立场、哲学思维、概念范畴、核心理论、话语表述”七大要义。然而,中国的学界在这七个方面发力不够,未真正建构起当代中国的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思想体系、评价体系,也未从学理上真正建构起体现时代水平的、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可以与西方理论比肩的、能贡献于世界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理论,未构建起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供哲学支撑的核心理论。

解决上述三大问题,构建面向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与体现世界发展趋势、时代发展水平的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理论,实属当务之急。当然,我们对这种“构建”需采取科学且严谨的态度。

### 三、建构引领新时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总体框架

时代的变迁必然使哲学改变自己的实现形式。反映并引领当今世界发展、时代发展、实践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构建和贡献什么样的核心理论?总体上,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的前提下,可着重从核心理念、哲学思维、中心理论、哲学表述

四个要素入手。这四个要素具有内在逻辑联系,可看作是引领世界发展、新时代发展和实践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总体框架”。

### (一)确立“普惠”哲学理念

“普惠”的哲学理念属于哲学理论创新所要确立的核心理念。普惠,本质上就是哲学的。哲学是爱智慧,哲学智慧能使人人受用、受益,使人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哲学是一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学问,也是一种对人的存在、发展、本质和意义进行理性反思的学问。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说到底是为了促进人自身的发展,使人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哲学家陈先达教授明确强调:哲学是普惠的学问。

当今世界呼唤普惠理念。第一,当今世界和文明多样化的趋势日趋明显,要求国与国之间“平等包容”的呼声日趋高涨,平等、包容、合作、共赢、共享日趋赢得大多数国家的青睐;同时,在坚持世界各国多样性的前提下,注重人类共同性、协商共识性、发展包容性、合作共赢性、平等共享性也成为大势所趋。普惠理念体现世界发展总趋势,注重学习世界一切国家先进文明的有益成果,主张世界各国可以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主张世界各国文明的平等且多样性发展,主张构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主张以合作共赢、和平发展、包容互鉴的方式,建设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显然,普惠理念是构建体现世界发展趋势和潮流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理论的哲学理念。第二,在我国发展起来且由大国迈向强国、引领世界权力逐渐向中国转移的大背景大格局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时代性、世界性命题,普惠理念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真正体现了世界发展趋势。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发表主旨演讲,提出“秉持普惠原则”“建设一个包容、普惠的经济全球化”“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等重要论断。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是把“普惠”作为建设持久和平世界的“根本原则”、推动建设经济全球化的“核心理念”和打造人类发展的“模式”的高

度来讲的。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核心理念就是“普惠”。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第三,“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总书记为反映世界引领经济全球化而提出的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战略,其思想精髓就是以世界多元、国家平等、文明互鉴、包容发展、协和万邦、和平合作、互利共赢为核心内容的普惠。在实践层面,“一带一路”倡议是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因此,可以被统称为“普惠之路”;“一带一路”的协同合作是所有国家平等相待共同参与的合作,是追求互利共赢和优势互补的合作,是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是实现多元、自主、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是促进繁荣稳定、扩大文明对话和互学互鉴的合作,因此,也可以被称之为“普惠之合作”。

当代中国实践发展要求确立普惠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系统总结国内外发展的经验,尤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的新要求,为实现迈向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而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既是为解决当今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出现的经济下行压力问题而开出的总体药方,也是使中国由大国迈向强国的总体发展之道。新发展理念涉及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发展基础、发展空间、发展目的等内容,对当前和未来我国发展具有决定性和引领性的作用。新发展理念在本质上蕴含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创共享共治”的普惠理念。创新蕴含着“共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协调谓之“共进”,绿色就是实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开放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创”“共进”“共生”“共赢”和“共享”实质上是从不同角度和方面来讲的普惠。这样的普惠理念,既具有哲学意义,提升到了人的类本质的高度,又具有世界意义,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当然,“共享”不完全直接等于“普惠”,共享只是包含在普惠之中的一个要素。

普惠理念具有其理论渊源和文本基础。一是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注重“和合”“协和万邦”“世界大同”“兼济天下”的普惠基因；二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关于“普惠”的丰富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具有解放全人类，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无论是马克思早期关于“人是类存在物”“人的类特性”“人的类本质”“类意识”“类生活”这些所谓抽象的“类”思想，还是马克思的理论成熟时期关于“人类社会”“共同体”“世界历史”“共产主义”“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这些在人类多样性基础上的“社会化人类”思想，在本质上都指向人类的普遍交往和融合，且使人们趋向共同性、共享性。列宁强调：“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含在一般之中。”毛泽东还曾指出：研究任何事物，都必须联系它的共性来把握个性，联系它的个性来把握共性。如果不认识共性，就无从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质，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原因和规律，如果不联系个性来研究共性，这种个性就是空洞的、无内容的、僵死的抽象。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关于多样性之间的统一性即“多方面规定性的综合、多样性的统一”的思想，是普惠理念的哲学基础。三是，习近平强调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普惠理念的集中体现，与普惠理念所蕴含的多样、共同、共识、包容、互鉴、合作和共享精神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哲学实质、精髓和灵魂就是普惠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核心观点、哲学精髓、总体表达。其核心内容是：坚持共享，超越零和博弈，建设利益合作共同体；坚持共识，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建设价值共同体；坚持共建共进，超越唯我独尊，建设行动发展共同体；坚持共治，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建设安全共同体；坚持共赢，超越结盟思维，建设合作共同体。显然，其中的共享、共识、共建、共进、共治和共赢的精神实质，就是积极培育和践行普惠理念。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普惠的性质和内涵，它是普惠理念的社会主义实现形式，是中国为实现普惠理念提供的中国方案。需指

出的是，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批判和超越资本主导的逻辑，从而走向以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理想社会，其指向显然是普惠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具有“中国特色”，也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普惠理念更具真理性、道义性和人类性，在这个意义上也可称之为普惠价值。历史来看，在所谓的“普世价值”中，虽具有某些合理因素，也具有诱惑性、迷惑性。我们更倡导“普惠价值”。普惠价值不否定、不排斥“普世价值”中所讲的价值，如自由、民主等，甚至坦坦荡荡、充满自信地高举自由、民主的旗帜，把这些价值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积极吸纳进来，从而进一步推进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然而，我们既要透过种种表象辨析和识别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本质，更要倡导普惠价值。“普世价值”是西方借价值所谓的“普世性”把西方特殊的价值观及其实现模式说成是全世界普遍适用的最高标准，再以强制手段向全世界推广，以排斥非西方世界文明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如不接受，就实施围堵打压，甚至发动战争，以达至维护西方中心地位与赢者通吃的目的。普惠价值，则是在注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进而强调统一性、共同性、平等性、包容性、互鉴性、协商性和共享性，全方位、全过程地以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的，一切为了世界各国人民，一切依靠世界各国人民，一切尊重世界各国人民。普惠价值不仅注重价值在形式上的普世性，而且更深入且从根本上前进一步，更强调价值在实质内容、实现方式和实际效果上的普惠性。

具体来说，普惠价值要澄清的是所谓“普世价值”在对外推广时，用“普世”价值掩盖其价值“观”的本质，“普世价值”以牺牲他国利益来获取自身利益。就整个世界而言，西方在把“普世价值”向他国推广时，所采取的方式和手段具有强制性或武力性，而且其实际效果往往背离“普世价值”中的价值理念。我们倡导的普惠价值的出发点是“多样平等”，方式是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结果是普惠全人类。普惠价值不仅从字面、形式上是普世的，而且从解释和实质内容上也是真正普世的，更重要的是，它在实现方式和实际效果上也是真正普惠的。由此，普惠价

值释放出的是正能量,它所产生的结果,是国家之间的正向合作共赢、和平发展。

从表象看,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讲的是普遍性价值,即全人类普遍都要讲的。然而其背后,意图在于维护其霸主国家的特殊利益和私有者的利益,在于巩固其霸主地位,绝不是普惠全人类。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统治阶级总是把自己阶级的特殊利益说成和扮装成人类的普遍利益。西方“普世价值”推广者亦是如此。普惠价值反对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来换取一国利益,反对掠夺打压和武力扩张,超越资本主义,揭示西方国家用“普遍”包装“特殊”、用所谓“先进文明”粉饰“掠夺”的本质,还原普遍性背后的特殊性。普惠价值也注重一国的发展,然而,它强调这种发展能为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发展作出贡献,注重一国发展对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发展的担当,尤其强调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担当;普惠价值也注重个人发展,但它注重的是每个人的发展;普惠价值极力倡导以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方式来建设全人类共同价值、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人类文明。总之,只有弘扬普惠理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引领我们这个时代。

## (二)树立“平等包容”哲学思维方式

近代以来,西方“一元论”“西方中心论”所体现的哲学思维,是“主体”统治“客体”。它强调西方世界是“主体”,非西方世界是“客体”,西方世界支配其他国家,采取“西方模式”,走西方道路。但是,这不符合世界潮流和时代精神,无益于人类平等包容发展,也引领不了世界和时代的发展。

世界和时代发展趋势,内在要求超越“主体”统治“客体”的哲学思维范式,逐渐走向注重主体际“平等包容”的哲学思维范式,实现哲学思维在范式或形态上的跃迁。平等包容是相对于“主体”统治“客体”而言的,其真谛在于世界各个国家不分强弱贫富,必须要尊重其主权,都有权自主选择适合自己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反映世界发展趋势,我们应坚持主体之间的平等包容,推动世界各国主权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当今中国的历史已成为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与国家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成为基本事实。这意味着“地球村”时代

真正来临了,人类愈发休戚与共,世界已没有独善其身的赢家。这也内在要求超越“主体”统治“客体”的哲学思维,走向注重主体际“平等包容”的哲学思维。

这种思维方式就其内涵和实质来讲,它注重交往主体之间的平等性、包容性,即平等对话和交往与包容性发展。在当今世界,这种思维方式突出体现在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追求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尊重各个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应当维护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在尊重各个国家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应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凸显世界潮流,具有国际视野、全球共识的战略高度,在不同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之间构建了一道桥梁,塑造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取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打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摒弃过去的冷战思维以及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零和博弈等陈旧思维,改变贫富两极分化的现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里,呈现的将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新景象、“命运与共、唇齿相依”的安全新局面、平等互利的交往新方式。显然,要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理论,就必须反映世界和时代发展趋势,在哲学思维上确立主体间“平等包容”的思维方式。

## (三)创立“普惠文明论”

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最关键的是要概括、提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理论,这就是普惠文明论。普惠文明论是相对于西方中心论而言的。西方中心论是当代西方的核心理论,西方的话语体系大都围绕西方中心论展开,靠西方中心论支撑,是西方中心论的表达。当今,西方中心论已经没有能力再来引领世界和时代的发展,必须构建反映世界发展趋势与时代、实践发展要求的新的哲学核心理论。

总体来说,哲学思想或理论是在最高层次上表达的“道”,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或理论。当今世界需要的最根本的“道”就是超越“普世价值”或“西方中心论”的普惠文明。我们应立足中国的实际国情,借鉴国外的实践经验,挖掘历史资源,把握当代脉络,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着力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中心理论。因此,既要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也要积极探索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战略问题。只有如此,才能从中提炼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理论。“普惠文明论”便能真正发挥引领当代世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核心理论。这一理论是关于中国道路及其世界意义、世界(文明)多样性与统一性和文明互鉴的理论。

具体来说,“普惠文明论”包含十个基本要素:世界多样;人类共同;中国道路;文明互鉴;凝聚共识;包容发展;协商共治;合作共赢;共建共享;共在文明。世界多样,说的是各美其美,世界各个国家在国情、发展道路和文明等方面都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人类共同是说美美与共,人类是一个“类”的共同体存在,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应共同参与全球治理,推进共同发展,达至世界和谐、大同、安全;中国道路是指各有特色,应根据中国的国情确定自己国家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一种新型文明;文明互鉴是指美人之美,各个国家需要互相借鉴汲取他国文明有益成果;凝聚共识是要寻求最大公约数,国家之间遇到各种矛盾和分歧时,通过协商达至共识;包容发展讲的是包容性发展,一国应接纳、认同他国不同的发展道路;协商共治是指各个国家通过平等对话、协商、交流,共同建设所共在共有的世界,共同推动世界发展繁荣,共同享有世界发展成果;合作共赢是指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共建共享指各个国家都是参与世界共建且平等互利的主体;共在文明是指确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的文明。这十个基本要素是一个有机整体,构成“普惠文明论”的总体性内容,需要从“普惠文明论”的总体性内容中再进一步阐述其核心内容。

其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成果,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立论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及其实践发展新要求而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是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集中且系统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成果即哲学核心理论的基础和源泉。提炼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成果即哲学核心理论,需要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离开这一基础,就会陷入“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境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内所强调的新发展理念,在国际上所强调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普惠理念或原则,都蕴含着普惠文明的思想基础。

其二,以世界(文明)多样性和统一性为立论前提。无论当今中国还是世界,既多样又统一、既交锋又交融是最基本的特征。提出并确立一种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理论,都应从哲学上揭示和阐释这一基本事实及其内在逻辑为前提。因为这一基本事实蕴含着事物的本质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蕴含着事物发展的内在矛盾和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它是理论创新的源泉和生长点。马克思创立的异化劳动理论是“从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一基本事实出发的,马克思创立的资本论是从“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细胞及其内在矛盾出发的。当今世界既多样又统一、既交锋又交融这一基本事实,内在要求普惠理念来引导,因为“普惠”在实质上意味着多样性(普)的统一(惠)、交锋中的交融。这种引导,既利于世界“生动活泼”、丰富多彩,也利于世界合作共赢、和谐共生。

其三,以中国道路及其世界意义为立论基石。中国道路的哲学精髓,是党的主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 and 人民主体力量的协调、优化并形成合力,这种道路既能加快中国发展又能保持自身独立。这三种力量及其合力是决定当代中国健康顺利发展的根本力量。人民主体力量体现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本质,党的主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分别从政治和经济上体现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当今世界格局,美国呈现的主要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文明,欧洲的一些国家呈现的主要是以社群或公民社会逻辑为主导的文明。中国道路及其哲学精髓蕴含的是一种普惠文明:中国共产党是具有世界眼光、战略思维与使命担当的执政党,它以普惠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时代使命;市场配置力量是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力量,是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推进力量,它把地域历史变成世界历史,使整个世界融为一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世界格局,这为普惠提供了基础;人民主体力量中的“人民”,既包括中国人民,也包括世界人民,它既依靠人民共创发展成果,又为了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其四,以文明互鉴和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华新文明为立论核心。当今,“西方中心论”仍有一定市场。随着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经过浴火重生,建立了一个新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让中华大地再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就中国的发展而言,党中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新发展理念;在世界层面而言,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始终展现出强劲的活力。“新发展理念”与“全人类共同价值”“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实质上是中华文明为人类和世界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它的哲学意义和世界意义,既在于借鉴并吸收世界一切文明有益成果,为人类和世界发展贡献一种新文明,也在于对构建当代世界新秩序和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思路和中国方案,回答了“中国能为世界贡献什么”,也回答了“人类究竟向何处去”这一世界之问、人类之问、时代之问。这种中华新文明,“以世界多样性、博弈性、不确定性和挑战性为基本依据,以辩证思维、类思维、平等包容思维为思想方法,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根本立场,以世界多样、国家平等、文明互鉴、包容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互利普惠为核心理念,以建设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合作共同体为核心内容”。其内核是“包容普惠”,即“普惠文明”。

其五,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且达至人类普惠为立论目标。普惠文明是在反映人类社会发展和时代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注重的不是某一

个或一些国家的兴盛,而是以普惠全人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价值目标。因此,它站在了真理、道义和人类发展的制高点上。

其六,由于普惠文明注重当代中国所承载的时代—历史使命,注重世界(文明)多样和统一,注重阐释中国道路及其世界意义,注重文明互鉴,注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重普惠全人类,所以它可以引领当今世界和时代的发展。

#### (四)构建人民共创共享共治的“普惠哲学”

“普惠文明论”属于什么样的“哲学”,如何对此作出哲学阐释、表述和命名?从哲学上讲,“普惠文明论”的核心内容是共创共享共治。哲学理论创新所要坚持的政治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所以,引领当今世界、时代和实践发展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理论可以提炼为人民共创共享共治的“普惠哲学”。这里需要作充分深入的哲学论证和说明。

第一,概念界定。“普惠哲学”是反映世界发展趋势、时代精神和实践发展要求进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成果。“普惠哲学”是一个关系概念,是指在当今全球化大背景下,国与国、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共利存在、互依互惠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们以“多样平等”的哲学理念进行合作共赢,共同去解决“人类究竟向何处去”这一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和难题,从而达至“人民共创共享共治”的结果和目的。

第二,人民共创共享共治的“普惠哲学”有其存在根据。在治国理政方面,人民共创共享共治的“普惠哲学”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有充分的根据,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分丰富,贯穿其中的核心价值取向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蕴含着人民共创共享共治的“普惠哲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使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价值取向是以人民为中心;强国之道是新发展理念;总体方略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国际战略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贯穿上述内容的哲学思想就是人民共创共享共治。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国注入了创新活力,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空前的创造力。胡锦涛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任务是实行“科学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理念成为突出亮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党中央治国理政较为突出的一大亮点是注重法德并治和协商共治,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共创共享共治是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三条根本路径。以“共治”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提供政治保障,“共创”“共享”为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

人民共创共享共治的“普惠哲学”体现了我国发展起来以后,面对新的历史方位进行整体转型升级的时代发展趋势和实践发展要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只有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人民才会具有创造性,社会才会充满活力。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不适合经济基础发展时,必须进行调整以保持社会的平衡和谐稳定。调整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革命;二是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相对滞后是当今中国发展过程中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西方社会注重过程正义,忽视结果正义,致使分配正义缺失,从而阻滞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其内在逻辑打破了过去以资本为主导的游戏规则。因此,社会主

义应该是以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要义是要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新活力,从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得好不好,最终要看它能否真正激发人民共建社会主义社会的创新活力,能否真正实现人民共享,能否真正使人民共同参与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治理。”如果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在社会中得不到真正体现,人民群众不能共享发展成果,不能参与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有效治理,社会就会变得缺乏创新活力,那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便无法显示出来,也就更谈不上超越资本主义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主要集中在解决好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三大根本问题。生产力方面,“激发人民创新活力”问题,使社会充满生机;生产关系方面,实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上层建筑方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人民共同参与治理”,即共治。这三大根本问题蕴含着“人民共创共享共治”思想。

基于上述理由,以人民共创共享共治为核心内容的“普惠哲学”可以发挥引领当今世界、新时代和实践发展的积极作用,从而能成为当今新时代所需要的哲学。当然,这种哲学还在建构中。

作者简介:韩庆祥,河南孟州人,哲学博士,中央党校一级教授。

(摘自《学术月刊》2018年第9期)